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▶ 戰爭可能民主化嗎？評汪宏倫主編《戰爭與社會》

A Dialectic between "War" and "Society" : A Review of
Horng-Luen Wang (ed.)'s "War and the Society"

doi:10.6752/JCS.201403_(18).0017

文化研究, (18), 2014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18), 2014

作者/Author : 李丁讚(Ding-Tzann Lii)

頁數/Page : 250-259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 :2014/03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403_\(18\).0017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403_(18).0017)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 的簡稱，
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
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戰爭可能民主化嗎？評汪宏倫主編《戰爭與社會》

A Dialectic between “War” and “Society”: A Review of Horng-Luen Wang (ed.)’s *War and the Society*

汪宏倫主編。2014。《戰爭與社會：理論、歷史、主體經驗》，台北：聯經，648頁。

李丁讚

Ding-tzann Lii

《戰爭與社會》是台灣第一本關於戰爭的社會學專書，主編汪宏倫的目的不只是在介紹現代戰爭相關概念，而是透過對現代戰爭闡明，「戰爭」有一個非常綿密複雜的社會面向，也蘊含極其豐富的社會學意涵。可能，「戰爭」的這箇社會學面向在過去，幾乎都被忽略了。因此，汪宏倫在導論中主張「把戰爭找回來」，就是嘗試把戰爭帶入「社會學」的理論與觀念視野中，讓我們看到戰爭的「非軍事面向」，以及這些「非軍事面向」與「社會」的各種具體連結，進而刻畫出「戰爭」與「社會」的細膩而複雜的關連。從這個意義來看，本書不只是一本對於戰爭個別現象的思想探討，更是社會學理論的重要論述。透過這箇新視野的提出，以及其所帶出的新概念，一些以前無法釐清的社會事實或困惑，都因此而有了新的發現與突破，為社會學的研究與方法，開拓出新的領域與範疇，其價值不言可喻。

儘管本書對「戰爭」與「社會」的關係提出了新的觀點與視野，值得肯定。但是，仔細來看，本書對「戰爭」與「社會」二者之間的關係，並沒有平衡看待，更缺少辯證的觀點。簡單地說，它所強調的關係是單方向的，著重在「戰爭」對「社會」的影響，但對於「社會」對「戰爭」的影響，則沒有正面處理。這是非常可惜的。筆者認為，如果只著重在「戰爭」對「社會」單面向的影響，必然總會看到戰爭無所不在，深入社會的每個角落，甚至抵達人類主體經驗的最深

層。在這個觀點下，戰爭看來很厲害、無所不在，好像「社會」只是挨打的份，無法對「戰爭」進行回應，或對「戰爭」進行節制或規範。這很明顯不是事實。因此，爲了探討戰爭如何被節制與規範的問題，我們必需把「社會」這箇因素擺進來，讓「社會」對「戰爭」的影響也被看見。筆者認爲，我們只有把這箇面向的影響帶進討論，才可望有效處理跟戰爭有關的倫理議題，進一步才可望釐清「戰爭」與「社會」相互辯證的理論性議題。

「戰爭社會學」或「軍事社會學」是一個存在已久的社會學領域，但其所處理的題材都是戰爭與軍事本身，對於「非軍事面向」的議題其實很少觸及。「新韋伯學派」如Charles Tilly, Michael Man, Theda Skocpol, Anthony Giddens等，對戰爭的討論雖也觸及非軍事議題，但仍然只是集中在暴力與衝突對大規模歷史變遷的影響，對更細緻的社會現象，如人口遷徙與流動、族群的對立與衝突、政治治理、社會動員、社會緊張、社會信任、社群凝聚、史觀論戰等議題，卻很少討論。對於個人微觀層次的議題，如戰爭的創傷與療癒、戰爭的記憶與遺忘等，更付諸闕如。因此，《戰爭與社會》不只與過去的「戰爭社會學」或「軍事社會學」不一樣，也與「新韋伯學派」的關注明顯不同，不只是一種超越，更是創新。其所收集的12篇文章，幾乎都是作者們在上述新觀點與新視野的引導下，經過多年研磨所集結而成，彼此之間有很綿密的關連性，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。這是主編與諸篇作者們多年辛苦的結晶，值得大家細心閱讀、思考。

值得強調的是，本書把「戰爭」的議題延伸到「社會」的面向，並不只是一種態度或期待，而是一個具體的方法，也提供具體的分析工具與概念。譬如，第三章汪宏倫提出「戰爭之框」這個概念，是分析戰爭遺絮的核心工具。我認爲，這個概念很有價值，是一個認識論的框架，讓分析者因此可以清楚掌握、有效釐清戰爭遺絮諸多面向，讓我們對「戰爭與社會」的討論，可以落實在具體的分析層次，也透過這種分析角度，我們對社會存在的困境或難題，突然得到新的角度與觀點，對社會的運作也有更多的瞭解。第四章黃金麟、第五章姚人多的研究，透過「以戰爲治」這箇概念，探討國家治理如何透過戰

爭，把政治滲透進社會的毛細孔，清晰有力的證明他們的論點：「社會」是「戰爭」的延續。這箇觀點有力的衍展了傅科的命題——政治是戰爭的延續，也為這本書的主旨作了最佳的詮釋。

本書對「戰爭」與「社會」的討論，其實還延伸到個人主體的經驗的層次，第七章藍適齊對「台籍戰犯」、第八章彭仁郁對「慰安婦」、第九章趙彥寧對「流亡老兵」的研究，都清晰而明確地指出，戰爭對社會的影響，已經進入人類最深層的主體經驗內核。這三種「零餘主體」所受到的傷害遠遠超過一般的戰爭創傷，更超出一般暴力所構成的傷害，因此其所需要的療癒方法，也不同於一般的個人諮商，而需要更集體性、更社會性、更公開性的療癒過程，也在一次證明，戰爭與社會有一個很深、很強的內在關連。其中，趙彥寧還進一步討論到，流亡老兵在經歷二次創傷、家人背叛之後，竟然因此轉化而產生淨化、震撼與提升，進而有能力做出「純道德實踐」，比一般的道德實踐的境界還更高。這些關於受傷主體經驗的討論告訴我們，與所有其他現象相比，「戰爭」對「社會」的影更深、更厚、更遠。但弔詭的是，社會學對這樣一種重要的現象，卻一直忽視它的社會存在，更不去分析它的社會性格。

不過，正如筆者在前面所說的，本書對「戰爭」與「社會」的討論，基本上集中在「戰爭」對「社會」的單方面影響，而對於「社會」對「戰爭」這箇面向的討論則很缺乏，更沒處理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。我這個講法也許不公平，因為本書的確有好幾篇文章都間接處理到「社會」對「戰爭」的可能影響，如第一章鄭祖邦的理論回顧，第二章與第六章朱元鴻兩篇有關戰爭倫理的討論，第十章莊佳穎有關戰爭電影的討論，甚至包括彭仁郁對慰安婦的討論。這幾篇文章本身其實都很精彩，但因為「社會」這箇關鍵性的因素沒有被正式提出，使得「社會」對「戰爭」的影響隱而不顯，而這這幾篇文章之間的內在關連也因此不見了。筆者認為，正是因為這箇面向的缺失，讓整本書原來的企圖——對戰爭進行對社會學的理论建構，也因此受到限制，非常可惜。因此，本評論嘗試把這幾篇文章擺回「社會」的脈絡，重新解讀這些文章。

第一章鄭祖邦的理論回顧，從馬基維利、克勞塞維茲、韋伯、到傅科一路下來，把「現代戰爭」、「民族國家」、「合法武力之壟斷」三個概念的關係進行有機扣連，對現代戰爭的特質，有深刻的掌握與呈現。但是，筆者要強調的是，很多民族國家其實也是民主的「共和」國家。而從克勞塞維茲開始，就把現代戰爭與「共和國」聯繫在一起，認為現代戰爭與傳統戰爭最大不同的地方乃是，傳統戰爭是君主個人的事，而現代戰爭則牽涉到「共和國」整體。到了克勞塞維茲，「共和國」的意涵更加清晰，包括人民整體。韋伯更帶進「合法性武力」的概念，認為現代國家所從事的戰爭，必須是人民認為「合法的」才會被接受。因此，這整個思想脈絡很清楚地告訴我們，在一個民主的「共和國」裡，戰爭必須經過人民的、也就是社會的認可才具有「合理性」。在這個視野下，筆者提出「戰爭民主化」的概念，嘗試闡明「社會」對「戰爭」的影響。「社會」能不能節制戰爭、規範戰爭、甚至停止戰爭，其實就是「戰爭」是否「民主」的問題。

第二章朱元鴻從史密特晚年的作品——〈游擊隊理論〉出發，對於這些非（歐洲）主權國家之間的各種武力對抗，進行很全面，但卻不失細緻的回顧，最後整理出兩種基本的戰爭/革命類型，也就是「戰爭共產主義」與「公民抵抗」。筆者認為，這個對戰爭類型學的分類，宏觀而精準，對戰爭理論的推進很有貢獻，是一個有價值的理論模型。尤其，作者指出，在1970年代中期之後，這兩種戰爭型態的能量，發生了轉移，「公民抵抗」逐漸取代「戰爭共產主義」，成為主權國家內部最有力量的抗爭形式。也在這個基礎上，作者進行了對未來的展望，包括戰爭人性化，或是正義戰爭的可能性探討，是一篇兼具眼力、洞見、以及視野的文章。但很可惜的是，這些討論沒有真正把「社會」的因素擺進來，也就是沒有真正處理「戰爭是否可能民主化？」的議題，而無法有效回應作者所提出的「戰爭倫理」這箇重要議題。

筆者認為，朱元鴻所指出的，大約從1960年代中葉「反越戰」運動開始，公民抵抗逐漸取代共產戰爭主義，成為國內戰爭，乃至反殖民主義的主軸，正是「戰爭民主化」的具體表現。簡單地說，戰爭從一種由上而下的領導、擅動、武力攻擊、謀殺、更換政權，逐漸轉

變成公民之間橫向連結、擴散、非暴力抵抗、節慶戲劇式的表演、問責政治、和平轉移政權，甚至包括對戰爭受害者的憐憫與關懷等。在這箇抵抗過程中，公民們從反越戰論述，到戰後關於「正義戰爭」的論述，大大地限制與規範了戰爭的範圍與性質，也讓「戰爭」經歷了第一次民主化。透過這個民主參與的過程，人類得以重新塑造戰爭的內涵，而不是被戰爭所型塑。我們如何把戰爭從「國家主權」轉移到「人民主權」，如何讓戰爭真正回歸公民的權力範圍，回歸「社會」，乃是戰爭民主化的核心問題。

戰爭民主化，其實是把過去被認為是戰爭的「客體」，重新納入戰爭的論述之中，變成戰爭「主體」，進而可以參與關於戰爭的討論與定義，進而決定戰爭。戰爭的客體包括過去所認知中的「公民」，以及戰爭中所有的「他者」，也就是交戰國的「敵人」，或其他受害者等。這些「客體」在過去都是無聲的，被戰爭的主體，也就是國族、以及國族的菁英，包括政治領袖等所決定。而戰爭民主化的構想，正是嘗試把這些本來各自分離、分立、甚至互相對立的「客體」，包括同一個國家之內的公民，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公民等從新連結，讓大家可以「看到」彼此的共同利益，聽到彼此苦難的聲音，進入杜威所謂的「相互依存」的狀態。這樣，公民們才有熱情、有能力重新定義戰爭、重塑戰爭的內容。這裡，我們已經看到戰爭民主化與「全球公民」的關連了。但是，交戰/敵對國之間的公民又怎麼可能連結呢？這很顯然是一個深刻而非常難於回應的問題。

朱元鴻第六章關於「遺忘」的討論，正是處理這箇艱難的問題，非常細緻，值得細讀。「渡盡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」，是魯迅關於二戰的一首詩——〈提三義塔〉的最後一句，描寫他與日本西村博士之間，也就是中國公民與日本公民之間，一個加害國、另一個受害國的不同公民，如何在經歷了戰爭中的各種殘殺、破壞、抵抗、與實踐，最後變成不分國族的兄弟，把兩個國族之間的恩怨都一筆勾銷——也就是「遺忘」。朱元鴻這篇文中，著重在哲學層次的討論，也就是「遺忘」是否具有「倫理」性質。他根據尼采的論點，認為「遺忘」是一種「再記憶」(re-remembering)的積極行動能力，具有倫理性格。

「遺忘」是不是一種倫理行動，固然有其哲學上的意義。但筆者認為，比這箇討論更重要的是，「遺忘」如何發生、如何可能的社會學問題。只有這個層面的回應能真正解決跨國公民如何連結、以及戰爭如何民主化等核心問題。而這箇問題，筆者認為，其實是可以從魯迅詩的前半段推論得知。這首詩的第一句是「奔霆飛鏢殲人子，敗井頽垣剩餓鴿」，很清楚是在描寫戰爭的慘烈，人死了，到處都是荒廢的房舍、地景，只剩下一隻活物——餓得接近死亡的鴿子，好像也找不到東西吃。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「人子」兩個字，這些在戰爭中死亡的孩子，魯迅並沒有特別指明是中國人或日本人，只說，這是「人子」，是「人」的孩子。不管是那個國家——加害國，或是受害國，所有因戰爭死亡的人都是「人」的孩子。但是，魯迅和西村為什麼能表現出這種「超越」呢？很明顯，戰爭的慘破，尤其是人的「死亡」，以及「死亡」必然帶給人的衝擊與反思，讓人突破「戰爭之框」的認識論限制，以致於有能力「遺忘」國族所給予的框架，進而有能力以「人」，而不是「敵人」來看待現場血淋淋的死亡，甚至還可以看到其他垂死的生命（鴿子）。

「偶值大宅離火宅，終遺高塔念瀛洲」。第二句詩乃是描寫這隻垂死的鴿子，因為碰到宅心仁慈的西村博士，而得以脫離火海險境，最後被西村帶回日本餵養，取名「三義」，期待生下小鴿作為日中人民友好象徵而送回上海。可惜鴿子死亡，博士將其立塚，並建塔「三義」，紀念中國戰爭中的亡魂。戰爭中垂死的鴿子，經歷了戰爭的破壞、瀕臨死亡、獲得新生、最後雖然無法如期創造新生命，但卻以「紀念塔」的形式存在。不管是新的生命，或是紀念塔，都同時包含中國與日本兩個成分，都是對過去的重建，都是一種新的實存 (being)，超越過去的存在。這箇新的「超越體」之所以能夠誕生，乃是西村博士透過疼惜鴿子，照顧鴿子，為鴿子立碑，懷念中國戰爭亡魂的實踐過程，逐漸確立的。如果第一句詩描寫「遺忘」，第二句詩則是交代，「再記憶」，或是「重建」之所以可能的機制。

筆者認為，魯迅這首詩很清楚的交代了，人之所以能夠「遺忘」，乃是在親眼「看到」戰爭的「極度苦難」後，才能「看穿」戰

爭的本質，進而慢慢體認到，國族間的界線原來只是一種「假象」，是一種「任意性」的建構，而不是「本質性」的存在。而且，在揭穿「假象」之後，還要透過具體的生命實踐、並透過具體的生命實踐(being)的創造，才能真正進入「再記憶/遺忘」的境界。這是一個積極行動、具體實踐的過程，更釐清了「遺忘的具體機制」，讓我們瞭解，「遺忘如何可能？」的社會學問題，才能進一步回應，不同國家的公民如何連結而變成全球公民，以及節制戰爭、甚至終止戰爭的可能性在哪裡。筆者認為，「遺忘」機制的釐清，對於我們的核心問題——戰爭能否民主化？提供了關鍵性的線索。簡單地說，戰爭能否民主化，或是「社會」能否「影響」戰爭，以及怎樣影響「戰爭」，都與「遺忘」/「再記憶」是否發生、以及如何發生有關。

第十章莊佳穎對戰爭電影的研究，處理台灣最近三部與戰爭有關的電影——《一九八五》、《海角七號》、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，探討電影當成一種文化商品，如何重新改寫戰爭的歷史、以及人們對戰爭的記憶。作者發現，這三部電影與過去電影很不一樣：戰爭已經變成故事的背景，愛情故事和人物劇情才是主軸和焦點。也正因為這種敘述基調的改變，這三部電影對戰爭歷史或戰爭記憶的再現，已經從過去的「沈重」，轉變為現在的「輕盈」——好像戰地寄來的「明信片」般，夾雜著溫柔的情感和淡淡的商品美學，輕撫現代人的心肺。而我們對戰爭的記憶也在這箇過程中被重組了。但是，筆者要追問的是，當戰爭記憶被重構了之後，我們對戰爭的態度、評斷會發生怎樣的改變呢？當戰爭敘事因為「美學」和「情感」的中介轉化而變得輕盈後，國族之間的界線，或是「戰爭之框」也因此開始模糊化了嗎？國族認同的疆界是否開始模糊呢？我的直覺是肯定的。可惜作者只做文本分析，沒有觀眾民族誌的探討，這個問題無法真正回應。

過去，戰爭記憶基本上是透過戰爭歷史的書寫來記錄承轉，而歷史書寫往往是菁英的責任，一般大眾無緣參與。但是這箇研究顯示，透過電影的改寫，戰爭歷史的呈現開始多元化，包括影像、聲音、符號、象徵、隱喻、旋律、色彩等大量出現，這些媒介跟過去歷史的文字敘事很不一樣，有更多空間容納閱聽人中介轉譯。因此，每個人都

可以有自己的詮釋或觀點，而集體記憶乃是在這個集體參與的過程中逐漸形成。作者稱這箇過程為「歷史記憶的集體民主化」。這是一個精彩的概念，可惜作者沒有仔細討論。如果擺在本評論關於「戰爭民主化」的脈絡下，我們也許可以追問：戰爭記憶的民主化，也會導致「戰爭的民主化」嗎？在這個集體建構的過程中，「受害者」與「加害者」的區分會不會逐漸模糊呢？不同的國族疆界會不會逐漸消失呢？「全球公民」是否更容易形成呢？如果我對這箇問題的直覺是對的，那麼，我們對「社會」影響「戰爭」的可能性、以及其具體的影響機制又多一分理解。

第八章彭仁郁關於「慰安婦」的研究，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，是放在「戰爭」如何影響「社會」的脈絡來審視。但是，這篇文章除了作者詮釋的角度之外，我們也可以從相反方向來看待，探討「社會」如何影響「戰爭」。作者的研究指出，一個對創傷主體具有療效的公共敘述，必然是一種由下而上，也就是由被傳頌的各種慰安婦故事所匯集而成。透過這個由下而上的匯集、整合、銘刻的過程，集體「肯認」了創傷個體，而個體也在集體「肯認」的過程中獲得重新連結與再生。作者稱這個過程為「分享」。但是，「分享」是一個雙向的概念；除了「集體」可以療癒「個人」之外，個人的「極度苦難」也可以帶來集體的療癒。筆者認為，參與公共論述的團體或個人在肯認慰安婦的同時，也解放了自己。

爲什麼慰安婦具有這種功能呢？從某個角度來看，所有的普世價值，如人權、民主、自由等，都具有這種超越的功能。但是，戰爭所引發的各種災難，尤其是各種極度壓迫、凌虐、死亡等，如慰安婦這種極端的苦難，更容易引發這種「超越性」——跨越黨派、地域、族群、性別、國族、社群等疆界，讓人民同仇敵愾而結合在一起。像傳統父權政治這種根深蒂固的問題，如果能經過慰安婦這種極度苦難的淨化與洗滌，比較有可能打破關於女人貞潔等傳統觀念，進而超越對女人的各種成見與束縛。很多慰安婦的資料也顯示，敵對國之間的公民、甚至是同一國家之內，不同黨派之間的公民，對慰安婦這種「極度苦難」都能跨越原來的界線，聯合對抗加害者。也在這裡，我們又

一次在戰爭中看到，透過「極度苦難」的論述，我們有機會創造出超越「極度苦難」可能性，進而產出寬恕、仁慈、與憐憫，我們前面討論的「戰爭民主化」才變成可能。

總結來說，本書精彩的點出了「戰爭」與「社會」的關係，超越過去只限於政治、經濟、歷史的戰爭研究，也為社會學的研究與方法，增添了新的視野與觀點，以及新的分析工具與方法，是一本精彩的社會學著作。但不足的是，本書對戰爭與社會的討論，基本上只限於「戰爭」對「社會」的影響，而對「社會」對「戰爭」的影響則隱而不顯，非常可惜。本評論透過「戰爭民主化」的概念指出，戰爭倫理的討論，必需從「社會」的角度來看待「戰爭」，也就是一國之內的公民，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公民，如何連結起來，重新定義戰爭，決定戰爭，而不是被戰爭所決定。這是「戰爭民主化」的課題。而這箇民主化的過程，從1960年代美國的公民抵抗已經開始了，目前這種公民抵抗的形式正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衍展、擴大。

戰爭民主化的可能性，如果不限於公民抵抗這箇形式，其實有更豐富的內涵。上述戰爭電影顯示，戰爭記憶已逐漸民主化。其實，這箇現象並不只出現在電影中，而普遍地出現在文學、藝術、音樂、以及各種更通俗的大眾文化中。這些大眾文化對戰爭記憶的重建，其影響力正與日俱增。其實，文化界對戰爭歷史的重建起源很早，約在1940年代二次大戰後，很多新的博物館、紀念碑等，開始以一種「反記憶」的形式出現，對戰爭提出新的觀點。Winter(1995)指出，二戰之前的戰爭紀念碑或博物館，基本上都在歌頌民族主義。但是二戰之後，新的紀念形式已經逐漸放棄過去的「國族史觀」，而改以「超越」國族界線的史觀出現。這些新的紀念物所傳達的已經不是「國族意識」，而是「人類」共同的情感。基本上都是對戰爭、尤其是戰爭所造成的迫害的譴責，而同情人類、包括敵國的受害者的苦難。這種對戰爭的超越是戰爭民主化的最大動力來源。

最後要強調的是，從上述幾個研究，如魯迅的詩、慰安婦的創傷、老兵的二次創傷等一再顯示，當戰爭對社會的破壞達到極致時，當人因戰爭而進入極度苦難的狀態中，一種「超越苦難」的可能性卻

因而誕生，人在這種狀態下反而有可能因為受到極度震撼而得到淨化與提升，進而能夠進行「純道德實踐」，或是能夠跨越原來的國族界線、或是解開原來意識型態的糾結，釋放出「解放」的能力。因此，「戰爭」與「社會」之間有一個辯證性。一國之內的公民要聯合起來對抗國族，反對戰爭，應該還是一個相對比較容易的課題。筆者相信，只要民主化持續進行，只要各種大眾文化持續對戰爭記憶進行重組，戰爭的論述就有可能回到公民身上的。但是，在一個全球的層次上，不同國家之間的公民、尤其是敵國之間的公民，要聯合起來抵抗國族，絕不是一個輕易的問題。似乎，人類只有繼續經歷各種戰爭極度苦難的震撼、折磨、親眼看到了，親身經歷了，才有可能創造出這種超越戰爭的可能性。

引用書目

Winter, J., 1995. *Sites of Memory, Sites of Mourning: 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al History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